

曹唐游仙诗恋情倾向探析

张振谦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 曹唐是晚唐重要诗人, 尤以游仙诗闻名于世。而崇道的时代氛围、道教房中术的流行及女性“仙化”, 促使曹唐游仙诗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恋情倾向, 主要体现在裁剪道教仙话爱情故事入诗、以游仙写世俗男女恋情、对道士与女冠恋爱本事进行仙化等几个方面。曹唐游仙诗的恋情倾向在中国古代游仙诗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曹唐; 游仙诗; 恋情倾向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2-0270-04

曹唐(797?—866?), 字尧宾, 桂州(今广西桂林)人。^①《太平广记》卷349云:“进士曹唐,以能诗名闻当世,久举不第。”唐宋时期,“京城咸颂曹唐游仙诗”。(《唐诗纪事》卷3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51也指出:“其《游仙诗》最著名。”曹唐现存诗歌170首,其中游仙诗121首,^②是中国古代游仙诗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关于曹唐游仙诗,学界有所关注,^③然而,对于曹唐游仙诗中的恋情倾向,除元人方回与近人程千帆先生外,少有研究。^④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就曹唐游仙诗恋情倾向出现的原因、主要表现及其价值和意义作一探究和剖析。

一、曹唐游仙诗恋情倾向产生的原因

首先,崇道的时代氛围及道教房中术的流行对曹唐游仙诗的恋情倾向具有催化作用。曹唐生活的唐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朝是道教崇奉的高潮时期,唐武宗“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旧唐书》卷18《武宗纪》),于会昌五年(845)发动了著名的“会昌废佛”事件,独尊道教。由于“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1](60)],唐穆宗、敬宗、武宗皆因服食丹药而中毒身亡。(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19《唐诸帝多饵丹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高官小民服食丹药的大有人在。服食丹药的同时,道教房中术在道徒、文人也十分流行。房中术是道教极力倡导的在男女性生活方面的养生术,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释滞》把房中术、金丹大药、行气并称为道教三大方术,并反复说房中术是修道成仙不可或缺

的手段:“闻房中之事,能尽其道者,可单行至神仙”“凡服药千种,三牲之养,而不知房中之术,亦无所益也”(《抱朴子内篇·微旨》)。从道教法术的角度讲,成仙长生与道教房中术也密切相关。《真诰》卷五云:“食草木之药,不知房中之法及行气导引,服药无益也,终不得道……若但知行房中、导引、行气,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也。”可见,服药和房中术对长生成仙均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关于唐代房中术是否流行,研究者大多根据“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2](3051)]的记载认为,自此以后房中术在道教中失传,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如果细读整篇《魏书·释老志》就会发现,此书中称寇谦之虽断改了房中术黄术一法,然而“经契故有百余法,不在断禁之列。若夫妻乐法,但凭问清正之师,按而行之,任意所好,传一法亦可足矣”。这充分说明房中术在道教内部一直没有禁断。从白居易之弟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也可以看出,房中术在中晚唐文人之间十分流行。^[3](第九卷)]因此,清代龚自珍《上清真人碑书后》一文曾明确指出:“至唐而又一变:唐之道家,最近刘向所录房中家。”^[4](297)]这里“道家”实指道教。

随着中晚唐城市的繁荣及市民阶层的产生,一种以“情欲”为核心的世俗享乐文化逐渐壮大,也促使文人了解更多房中术知识,以便玩乐、长生双丰收。曹唐作为诗已“大播于时”的著名文人,又曾为道士,对当时流行的道教房中术定不陌生。如曹唐很熟悉全书充斥着房中术影响下的人仙恋爱故事的道典《真诰》,娴熟地运用其中萼绿华典故(《萼绿华将归九疑

留别许真人》),与房中术有关的道教《阴符经》也常置床头,“除却《阴符》与《兵法》,更无一物在仪床。”(《哭陷边许兵马使》)沈祖棻先生曾言:曹唐的游仙诗“就其实质来说,都是道教的宣传作品。”^{[5](155)}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其游仙诗恋情倾向与道教房中术流行及曹唐道士的身份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其次,时至中晚唐,道教向社会各阶层和文化各个层面更加广泛地渗透,表现出世俗化倾向。唐朝统治者把道教视为国教而大力提倡,举国上下信道者不胜数。但是,这些人身在道观,心在凡间,她们的离愁别绪、悲欢离合与普通人无异。此时,文人习惯把妓女或者美女比做神仙,把狎妓称为“游仙”,祈求能获得遇仙结婚之艳遇。而女冠却没有把自己当做超凡脱俗的仙女,她们此时道心未铁、俗情未泯,表现出强烈的思凡情欲。陈寅恪先生指出:“至于唐代,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6](107)}就这样,在道教风气越演越烈的中晚唐,一大批空虚无奈的文人士子和相当数量风流浪漫的女冠不期而遇,一拍即合。女冠艳丽的衣着和娇媚的容貌正好满足了文人在“人间”寻求“仙女”的虚幻心理;^⑤而女冠的风流浪漫又满足了他们在“仙界”享受“人间”欢娱的世俗情欲。女冠也可以和文人相互酬唱,优游山林,满足了其内心深处的恋情情结。道士出身的曹唐对当时道人生活颇为了解,借仙家之意写男女情事,作游仙诗隐写女冠,应在情理之中。其《萼绿华将归九疑留别许真人》中的“萼绿华”,道经《真诰》亦载:“访问此人,云是九疑山中得道女罗郁也。”可见当时女冠世俗化倾向之一斑。这大概就是曹唐游仙诗恋情倾向出现的社会心理和宗教文化背景。正如施蛰存先生在其《唐诗百话·晚唐诗话·曹唐》中所言:“到了唐代,‘仙’字产生了新的意义。唐代文人常把美丽的女人称之为仙女、仙人。因此又把狎妓成为游仙。……曹唐的游仙诗,便是从《游仙窟》发展而成的。”^{[7](644)}《游仙窟》中的女子没有了魏晋遇仙小说中仙女的矜持与稳重,而增其淫靡、放浪,逼近娼门。从两种文体互相影响的角度来看,游仙诗从郭璞到曹唐的发展与游仙小说可谓同质同构。

道教房中术在中晚唐的盛行、女冠风流世俗化、道教故事中投合世俗趣味的男女欢会结成仙缘的内容等等,都刺激了文人追求世俗情欲的欲望,诚如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杂考·二唐传奇与唐戏》中分析的那样:“唐士子倘失意于科举,蹭蹬无聊,辄来绮思幻想;而访道游仙、入山艳遇等,乃触绪环生。”而据现有曹唐生平资料,曹唐屡举进士不第,沉郁下僚,

很可能从失意到幻想,通过游仙诗中的恋情成分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而其道士生活经历,也为其恋情游仙诗提供了素材。例如其《小游仙诗》第23首:“玉皇赐妾紫衣裳,教向桃源嫁阮郎。烂煮琼花劝君吃,恐君毛鬓暗成霜。”写一位仙女穿着玉皇大帝御赐的漂亮衣服,到“桃源”(应指天台仙境)寻觅情郎阮肇,见面后,她奉劝对方多吃仙果“琼花”,这样就可以长生不老,就可以永伴自己享受美好爱情。据《册府元龟》卷54载:唐宝历二年(826)五月,唐敬宗“赐浙江送到绝粒女道士施子微紫衣一袭,绢六百匹,铜器二百事。”当时曹唐在严公素幕府作从事,当有所听闻。此事件应为“玉皇赐妾紫衣裳”诗句本事。作者把自己与女冠的交往想象为遇仙谈情,生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游仙诗。正如《唐才子传》卷8所云:“(曹唐)始起清流,志趣澹然,有凌云之骨,追慕古仙子高情,往往奇遇,而已才思不减,遂作《大游仙诗》五十首,又《小游仙诗》等,纪其悲欢离合之要,大播于时。”

此外,游仙诗发展至曹唐而大变的文学现象与晚唐的诗风、世风不无关系。晚唐的韩偓、李商隐、温庭筠等诗歌大都属于香艳一派,诗歌中多艳情描写,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曹唐游仙诗产生了影响。晚唐国势不振,举国上下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女冠并不潜心修道,而是凭借个人的才华容貌,在与文人交往过程中常产生爱慕之情、相思之意。加之当时的道教已经走上世俗化的道路,因而道教中仙、妓不分的现象屡见不鲜,此时的文人也对此往往做一些隐秘化的描写。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是李商隐和曹唐,二者均把人生的道教体验反映在恋情诗中,正如清人薛雪所言:“一样灵心,两般妙笔。”^{[8](148)}尽管二人在创作途径上各有独到之处,但他们共同将游仙诗引上晚唐香艳诗风轨道上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此外,闲适享乐、崇尚奢靡生活的社会思潮,宽松的文化环境导致了浪漫向上的文人心态也促使了世人感官享乐的膨胀。这种追求世俗情欲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推动了曹唐游仙诗的产生、繁荣。

二、曹唐游仙诗恋情倾向的主要表现

曹唐在晚唐道教世俗化、美女仙化、女冠媚妓化的时代氛围下,其游仙诗表现出了明显的恋情倾向。其创作方法与郭璞以来诗坛长期遵循的“坎壈咏怀”“列仙之趣”的游仙诗传统已大不相同。而是往往借助神仙道教掩饰人间情欲,使世俗恋情甚至狎妓行为大大雅化了。这正好满足了曹唐“平生之志激昂,至

是薄宦,颇自郁悒”的思想深处所需求的“美人——羡仙”情结,同时也道出了广大文人的心声。正如程千帆先生《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一文中所言:“曹唐《大、小游仙诗》所咏之人,不尽女仙,而实以女仙为主;所咏之事,不尽情感,而实以情感为多。唐世所谓仙人,含义既或如此,则谓尧宾之作,虽用古代神仙故事为题材,实以当时女冠生活做影本,或非不根之谈。”又云:“尧宾又尝为道士,于被教典籍,窥览颇多,加之唐代女冠,风气如此,则其假借天人情感之咏歌,以迎合当日社会之心理,‘大播于时’,诚不足怪。”^{[9](303-305)}

现存曹唐游仙诗包括17首《大游仙诗》与98首《小游仙诗》。其《大游仙诗》用七律写成,除《紫河张休真》《皇初平将入金华山》二诗外,内容均写男女恋情故事,其情节模式或女仙下凡会见男子,或凡夫迷途遇女仙,或相恋之人双双修炼飞升,或男女仙人宴饮交游,均涉红尘恋情。曹唐可以完全在信仰的范围之内对道教神仙典故发生感悟,进而加以化用,剪裁入诗。如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女的神话故事曾受到历代道教徒的喜爱,也被曾为道士的曹唐采撷而作为诗歌题材。曹唐《大游仙诗》中用五首组诗完整描绘了刘、阮故事。首先来看其一《仙子洞中有怀刘阮》:

不将清瑟理霓裳,尘梦那知鹤梦长。

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

玉沙瑶草连溪碧,流水桃花满涧香。

晓露风灯零落尽,此生无处访刘郎。^⑥

这首诗写和刘晨、阮肇分别以后,仙女心中产生了深深的相思和怀念,写得令人肝肠寸断。尤其是颔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仙女无比孤独和无限相思之情,甚为动人。因为人间仙界阻隔,无路可通,相逢重聚已经不可能,因此这里的爱情显得越发可贵和真挚,相思也显得更加痛苦。因而清人黄子云《野鸿诗的》卷103谈及“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时云:“玉溪《无题》诗千娇百媚,不及此二句缥缈销魂”。整首诗描写的是仙子在刘、阮回归人间后的离别之苦、相思之情。此外,还有《刘晨阮肇游天台》《刘阮洞中遇仙子》《仙子送刘阮出洞》《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四首。曹唐大游仙诗的价值在于,它是仙话与游仙诗的第一次结合。而曹唐把男女欢会、仙凡艳遇之类的仙道爱情故事用游仙组诗的形式写出来,具有完整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及人物活动的环境(一般是仙境),游仙诗至此而有由仙话向传奇嬗变的趋势。正如任半塘先生《唐戏弄·杂考·二唐传奇与唐戏》所言:曹唐游仙诗“可能为传奇小说,亦可能为说唱本。”

此外,还有杜兰香下嫁张硕(《玉女杜兰香下嫁张

硕)、牵牛织女(《织女怀牵牛》)、萧史弄玉(《萧史携弄玉上升》)、萼绿华与许真人(《萼绿华将归九疑留别许真人》)、汉武帝西王母故事(《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等等,曹唐《大游仙诗》善于把这些故事加以演绎,发挥高超的艺术想象力,演化为仙人和仙境的美好而生动的情景,从而赋予这些已在道教经典和一般传说中被程式化的“人物”和爱情故事以新的生机,描绘出仙人、仙界的鲜活的艺术形象,给人以强烈的美感和生动的印象。

曹唐所作98首《小游仙诗》是一组七言绝句,这组诗“前后虽无联系,而涉及情感,披文可见者,亦达三分之一强”^{[9](300)}。其《小游仙诗》的内容写情者居多,主要写男女恋情或女子的怀春之情。如其二十二:“九天天路入云长,燕使何由到上方。玉女暗来花下立,手授裙带问昭王。”虽然借用巫山故事,但却着意渲染仙女的娇羞与多情,仿佛是一位追求爱情的人间少女。其五十九:“风动闲天清桂阳,水精帘箔冷沉沉。西妃少女多春思,斜倚彤云尽日吟。”描写了一位仙子的思春之情,可能在思念远处的情郎,或者渴望找到一位如意郎君。在诗人笔下,这些仙女宛如世间少女,自然亲切。此外,其七描写恋人别离时的惆怅:“黄龙掉尾引郎去,使妾月明何处寻。”其三十三写少男的初恋:“玉童私地夸书札,偷写云谣暗赠人。”其四十八写痴情男子薄情女:“云鹤冥冥去不分,落花流水恨空存。不知玉女无期信,道与留门却闭门。”其六十二写一对痴情女子薄情郎:“闻君新领八霞司,此别相逢是几时。妾有一觥云母酒,请君终宴莫推辞。”其九十八写少女的初恋:“攀花笑入春风里,偷折红桃寄阮郎。”这些仙境恋情生活,写得情真意切,给游仙诗增添了一种仙道情韵的特有风致,既折射出诗人对爱情的重视和赞美,又反映了诗人心目中仙人的可亲可近。这是与魏晋、唐代中前期及宋后游仙诗的一个显著区别。

总之,曹唐游仙诗在道教神仙面纱的背后,隐藏的是男女之间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其《紫河张休真》《王远宴麻姑蔡经宅》虽写仙宴,实写人间欢情;至于那些写仙女与凡人相爱的题材,不言自明。和以往的游仙诗相比,曹唐借仙话入诗,名为游仙,实乃谈情说爱。曹唐游仙诗中所写仙女与凡夫之恋,表现了恋情的雅化。诗人托寓神仙相匹、人神相恋,或摄取神天仙道,世外传谈,或假借游仙、梦境,而以比兴、象征及暗示手法抒写一己之恋情。曹唐游仙诗把爱情诗和游仙诗很好地结合起来,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如朱光潜所言:“自曹唐以后,游仙诗就与宫词合流了。”^{[10](246)}即他认为游仙诗渐渐与男女之情的影射合

二为一了。

三、曹唐游仙诗恋情倾向的价值与意义

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郭璞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游仙诗著名于世的诗人。唐代游仙诗较为兴盛，出现了李白、李商隐、李贺等著名的游仙诗人，而曹唐游仙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可谓宋前游仙诗创作的最高峰和集大成者。其实，在曹唐之前，游仙诗创作运用的技巧和素材已有重复和陈腐之嫌。然而，曹唐却通过“游仙——恋情”的路径使游仙诗走出了这一文学的困境。从“情”的角度赋予了游仙诗的新生命，再次创造出游仙、遇仙的神话，树立了游仙诗史新的典范。

在游仙诗发展史上，曹唐的主要贡献就是将游仙的“游”的趣味安置在新的神话世界中，将游仙的“仙”的特征转化为美丽多情的女子，让人与仙的相遇关系具有了世俗情趣和道教的宗教体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不囿于原有神话故事的叙事模式，而借助诗歌的抒情功能，不仅抒发人仙之间的相思之情，而且增加了几分浪漫情怀。例如，现存的五首刘阮误入天台诗，曹唐的创作建立在大家熟知的神话故事间架上，但只提纲挈领地进行勾勒，并非复现刘阮遇仙的情节，而是深入刘阮与仙女的情感世界中，化身为剧中人，描绘男女双方的内心戏分，达到类似诗剧的艺术效果。而这个组诗则是被作者俗化、妓化的新传说，表现出洞里春思，有怀刘郎的恋情倾向。而原来神话中的“忽复去，不知所以”也被作者改为《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用“玉真”隐喻娼妓，用“洞中春”对照“人间路”的手法来写人间仙窟景象，活现了妓女与风流文人的关系。从初唐张文成的《游仙窟》到晚唐孙《北里志》，娼妓文化和游仙文化融为一体，这是刘阮故事流传的新社会文化背景。曹唐将这一文化现象摄入游仙诗创作之中，根据仙话、传说、故事改编而成，风格缠绵悱恻，完成了仙话和游仙诗的第一次结合，这是其游仙诗的主要价值所在。

在道教房中术兴盛及仙妓合流的文化背景下，曹唐为游仙诗寻找出了一条特殊的创作方向：将散文化、小说化的神话故事重新处理并结合时人恋情心理赋予新意，并采用具有强烈抒情功能的诗歌形式表达出缠绵悱恻之爱意，使其游仙诗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恋情倾向。进而使其游仙诗在晚唐诗坛上独树一帜，《唐才子传》卷8载曹唐诗“大播于时”“曹公诗，在唐、宋时尝显矣”。后人创作游仙诗也常以其作为模版。清人厉

鹗《前后游仙诗百咏自序》云：“效颦郭璞，学步曹唐，前后所为，数凡三百首”。可见游仙诗史中曹唐地位之重要。如果说郭璞游仙诗是借游仙写失意之悲，发内心之苦闷，那么曹唐的游仙诗则是借游仙写世俗男女之爱情，其情真意切，乃是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抒情诗。而曹唐与郭璞可谓中国游仙诗史上的“双子星座”。

注释：

- ① [宋]计有功《宋诗纪事》卷58云：“（曹）唐，字尧宾，桂州人。初为道士，后为使府从事，咸通中卒。”[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4亦云：“曹唐，字尧宾，桂州人。初为道士，咸通中为使府从事，卒。”[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8《曹唐传》亦载：“曹唐，字尧宾，桂州人。初为道士，工文赋诗。大中间，举进士。咸通中，为史府从事。”今人梁超然《晚唐桂林诗人曹唐考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一文中推测其生卒年当为（797？—866？），享年在66与68岁之间。
- ②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收录151首、陈尚君《全唐诗补编》补10首，查屏球《新补〈全唐诗〉102首——高丽本〈十抄诗〉中所存的唐人佚诗考》（载《文史》2002年第3期）中增补9首。曹唐曾作《大游仙诗》50首（《唐才子传》卷8《曹唐传》），现存17首；《小游仙诗》98首。
- ③ 主要有程千帆《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李乃龙《论曹唐小游仙诗的文学意义》，《广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李永平、高慧《晚唐曹唐游仙诗中的仙洞原型——兼及历史演进中的乌托邦定势》，《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李丰楙《曹唐小游仙诗的神仙世界初探》，《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 ④ [元]方回《瀛奎律髓》卷48云：“曹唐专借古仙会聚离别之情，以寓写情之妙耳。”程千帆《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一文认为“尧宾游仙诗乃天人情感之咏唱。”但认为曹唐游仙诗没有郭氏游仙诗的寄托之情而说其格调不高，故也略有提及。
- ⑤ 《东观秦记》上卷载：至德观女道士“盛服浓妆”；康骈《剧谈录》记载：唐昌观女冠“皆束髻黄衫，端丽无比”，以致“观者如堵”；《北梦琐言》亦云：“宫妓多衣道衣，簪莲花冠，施脂夹粉”。
- ⑥ 本文所引曹唐诗均出自陈继明注《曹唐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文献：

- [1] [唐]李肇，赵璘。唐国史补、因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2] [唐]张太素。魏书·释老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 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M]。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99。
- [4] [清]龚自珍。上清真人碑书后[C]//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 [5] 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6]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7] 施蛰存。唐诗百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8] [清]薛雪。一瓢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下转 280 页)